

# 第1章 绪论



**摘要：**本章重点介绍了本书的主要内容，揭示了熊彼特式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一个独立因素，不但创造了新的附加值，也可能成为新的经济发展理论的“干细胞”（Stem Cell）。新古典主义方法没有阐述创新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导致了基本经济理论与现代经济实践之间的分歧。

本章分析了这种分歧对经济理论与实践的威胁和消极后果，以及消除这种分歧的积极影响。读者可以重新审视一些已知的问题，认识新的方法。

**关键词：**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 熊彼特式创新的基本范畴 新古典理论与创新行为的分歧 创新发展的政治经济学

本书的主题可以归因于现实世界中存在的一个基本现象，它的真实性并不总是能被科学马上解释，而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阐明这一问题。一个典型的案例是关于太阳系结构的讨论。科学家们花了大约 150 年的时间，才放弃了统治 1 300 年之久的托勒密地心说，转而支持哥白尼的日心说。我们认为，当前经济学家在对待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经济发展理论》<sup>①</sup>时，也存在着类似情况。熊彼特在这一理论中提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是“创新”这种现象<sup>②</sup>。

我们每天都能观察到这种现象。公司、大学、政府机构、媒体、书籍等不断地提供这方面的信息。但是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仍然忽视这一点。用上述历史案例可以做一个类比：每个人都能看

---

① 本书的全称是《经济发展理论：对利润、资本、信用、利息和商业周期的研究》（*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 Inquiry into Profits, Capital, Credit, Interest, and the Business Cycle*），是熊彼特首次系统阐述创新理论的代表作，1911年最早以德文出版，1934年出版英文版，中文版由商务印书馆于1990年出版。——译者注

② 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两个概念联系紧密，以至于很多学者（包括本书作者）对此不做区分，经常将二者等同起来。但是从创新的角度来看，二者的内涵存在较大的差异：经济增长主要是经济总量的增加，而不考虑增长的动力和经济结构的变化；经济发展不仅是经济总量增加，还包括经济结构、产业组织、生产方式、技术和福利的改变，新兴产业涌现以及传统产业的衰退等。本书在翻译的过程中，保持了作者原来的用语。——译者注

到和感受到创新，但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基本（主流）经济理论并没有在其科学范畴中将它恰当地呈现出来。读者对这句话的第一反应很可能是批评性的：“这不是真的！”或“那不可能！”然而，本书的写作正是为了证明这一结论的正确性，并提请理论界和实践者注意上述分歧的实际存在。更重要的是，本书试图证明这场争论对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的风险和负面影响。

熊彼特提出新的发展理论已有 100 多年的历史。然而，如前所述，主流经济理论仍然不认为创新是经济增长的独立决定因素。资本（K）、劳动力（L）、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等要素被认为是（生产函数中）传统生产要素的主要组成部分。但熊彼特科学地证明，创新正在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决定因素，并且与现有的资本、劳动和全要素生产率等要素是相对独立的。

由于现代主流经济理论没有把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视为一个系统的科学学说，在本书中，我们想提请读者注意事物现有的概念状态。这就是本书用专门一章阐述这一学说具体内容的原因。

本书提供的证据表明，当代大学政治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经济学现有教材几乎没有详细、系统地阐述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该理论把创新作为经济增长的一个单独的关键要素。另一方面，我们指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在微观层面，创新是所有成功企业战略的主要组成部分；在宏观层面，创新政策是发达国家和有活力国家经济战略的主要组成部分。目前，学术界已经

发表了数十万篇关于创新活动实际问题的研究论文，还出版了数千本关于创新管理和营销的学术著作和畅销书，这些论文、著作对不同国家的创新过程进行了多维度实证分析。但是在大学里，学生们在学习经济理论基础教材时，并没有看到对创新的现代需求和实践。

因此，几个需要研究的问题就出现了。关于熊彼特的创新现象，为什么在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实践之间形成了如此巨大的概念鸿沟？为什么 100 多年过去了，它仍然存在？这种鸿沟的存在对经济理论和实践有什么挑战和负面影响？熊彼特的创新范畴构成了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这一认识对经济理论和实践的积极影响是什么？本书试图在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概念框架下回答这些问题。这也是本书的独特性和原创性。

据我们所知，本书中提出的理论分析方法具有高度的新颖性（这一点在正文中得到了部分证明），因此我们可以接受任何批评，并且可以进一步发展。此外，“帕尔格雷夫支点”（Palgrave Pivot）系列出版物的定位是简要介绍各学科主要的新思想，这些新思想将在后续出版物中进一步披露。

本书的主要发现与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的范式假设有关，这些假设赋予了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一个独立的、在概念上不同于主流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学说地位。熊彼特理论的这些假设可以说是创新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基础。

考虑到本书的定位，我们主要关注熊彼特理论中很少或完全

没有被其他文献揭示的概念。因此，我们较少关注熊彼特理论中已在科学出版物中得到深入研究和介绍的某些成果。首先，我们要研究的是不断发展的非正统理论，特别是演化政治经济学关于创新对非均衡经济发展的作用与分析，以及复杂性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关于不确定性政策的分析，并且考虑当代经济以高技术创新为核心的特征。

那么，这些鲜为人知但对经济理论和实践极为重要的熊彼特理论的概念是什么呢？我们在本书中探讨这些概念以证明讨论创新发展的政治经济学新学说是否合适？

首先，创新理论是熊彼特颇具启发性的发明，即创新是新的独立生产要素，它本身可以创造新的附加值。这是因为创新创造了“一种新的购买力”，然后通过信用转化为创新者的收益。这一利润不是前一时期国家总收入重新分配的结果，而是作为新增加的价值而产生的。这就是为什么熊彼特的创新可以确保实际的经济增长，也就是国家 GDP 的增长。因此，在“帕累托效率”状态下，熊彼特式创新可以通过创造新的创新资源，在不增加给定资源的情况下，广泛地增加一个国家的 GDP。

我们认为这是经济科学中的范式性突破，因为它有助于解释许多现代经济现象，并为创新发展模式提供理论依据，但是对于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来说，这些现象充满神秘色彩，包括：主流经济理论存在一个“生命周期”，在短暂的主导地位之后不可避免地衰落（当前的新古典理论也处于危机之中）；无法解释一些

特殊收入的本质，如股票价值的增长，迅速产生数十亿美元的收入，并创造了数千个新的百万富翁；通过知识资本产生新的附加值；在现有的资本和劳动生产力条件（创新出现之前）下，无法实现的非通胀性工资增长，但在创新条件下可以轻松实现；高附加值生产活动的经济性质（如果没有熊彼特式创新，这些现象很难仅仅因为商品加工程度高而得以解释）；服务业在发达国家 GDP 中的主导地位。

熊彼特理论的第二个重要概念模块，同样被新古典经济学所忽视，是解释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本质，以及通过理解历史背景下创新过程的流动来克服危机的机制。熊彼特的理论方法与新古典主义逻辑的区别在于，它对市场体系内力量的认识更加深刻，市场体系决定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同时也决定了复苏和经济增长。这种力量就是创新。

当以往的创新成为传统的生产资源时，国民经济将不可避免地陷入危机；技术变革的不断创新有助于克服这种危机，刺激经济增长。于是，创新就变成了“无止境的转变”和“无止境的技术变革”。

一般意义上，我们考虑用两种不同的方法来解释经济增长和商业周期的本质——新古典主义和熊彼特主义。第一种观点认为，支持产出、投资、消费和就业之间主要比率常数的一般均衡是有效的：这种方法路径没有特别关注国民经济技术结构的比例。相反，熊彼特方法着重关注技术创新的出现和不同技术创新水平部

门的经济结构。熊彼特将这两种方法称为周期性经济发展的“静态”和“动态”阶段。熊彼特认为，真正的经济增长只能在“动态”阶段才能实现。这一观点在新熊彼特主义方法中得到发展，我们利用这些方法来阐述相关的分析工具和建议，以便加强经济政策。

熊彼特式创新理论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模块，是创新导致经济现有状态与未来状态之间毫不妥协的分离。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是一种描述形势发生根本性变化的理论：一种向新质量（新组合）的飞跃，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法预见的。因此，必须特别关注这样一个事实：为了确保一个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必须在创新性技术的基础上形成新的生产结构，而不是改造传统的生产结构。这些传统结构对于保持该国现有的产品范围和支持经济“静态”模式的运行具有重要意义，但经济系统的“动态”模式直接关系到创新发展和该国的经济增长。本书中，我们将证明这一发现对转型经济体特别重要。

本书的书名分为两部分：“创新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和“打破经济理论的恶性循环”。我们认为熊彼特的创新概念作为创造新附加值的独立因素，在经济思想史上与不同的主流经济理论有着直接的联系，但这种联系一直是看不见的“暗线”。熊彼特的创新不但改变了经济世界，而且也改变了主流理论。在本书中，我们展示了在过去和现在将创新范畴纳入主流理论系统存在的问题。本书试图为我们的假设提出论据，即主流理论已经衰落，因为它没有考虑熊彼特式创新的意义。这就可以解释当任何主流理

论都无法长期保持这种特征时，经济理论就会陷入恶性循环。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也不例外。

我们回顾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解决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时，也存在着某种“恶性循环”。我们认为其中存在两个相互关联的关键问题（或主要研究问题）：“各个国家是如何致富的”（“国富论”）和“附加值的本质是什么”。每一个获得“主流”地位的政治经济学新理论都提出了一个关于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驱动力）的新理论，并否定以前的理论。这源于“附加值”这一新概念的发明。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仍以旧的增值概念为核心，这样的经济将会继续面临危机的威胁。

本书中，我们论证了每一个核心理论都存在“生命周期”。在实际应用之初，每一个理论都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但后来的危机引发了革命，之后的新经济发展又受到新经济思想的贯彻、新主流理论的形成以及对新发展要素的认识等因素的制约。今天，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又一次陷入危机，正如历史上许多专家所说的，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衰落。在本书中，我们旨在证实这样一种观点：为了复兴政治经济学，必须将熊彼特的创新概念作为理论框架的一个关键部分。

同样，我们可以观察到新技术范式对形成不同主流经济理论的影响。众所周知，技术变革在历史上对许多经济和社会过程产生了影响。但是我们发现，在主流理论的关键概念范畴中，没有技术创新的独立地位。正如我们所展示的，资源生产率这一概念

并不能全面反映熊彼特的创新。创新推动了新的经济关系和概念出现的现象。然而，这一因素在主要理论的核心结构被确立和讨论过程中始终处于阴影之中。为什么创新没有成为政治经济学的主要概念范畴？我认为这是经济思想史上的一个谜。这里我们也尝试给出一些解释。本书中，我们把熊彼特的创新概念定位为“关于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的“干细胞”<sup>①</sup>。

读者一定想知道本书中的分析和结论有什么实际意义。它们今天有实际应用吗？我们试图在正文中回答这个问题。在绪论中，我们将简要介绍本书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主要发现。

分析表明，主流经济理论中缺少熊彼特式创新的概念范畴，使得它们无法充分解释由于经济系统技术范式变化而发生的经济过程。首先，这是由于对技术范式衰退阶段（康德拉季耶夫长波）和对周期性出现的全球经济危机原因识别不当造成的。因此，这些理论不仅因为失去了解释功能而走向衰败，而且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预示着经济体系的崩溃。

今天，我们可以清楚地观察到这样的过程。以新古典主流理论为基础的经济政策，只有在经济体系的“静态”模式下才能显

---

<sup>①</sup> 明确经济发展的主要内在因素，对于确定系统性经济问题并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非常重要。历史分析表明，尽管经济社会发展过程的形式千差万别，但用于确定一国经济政策主要方向的特征却寥寥无几。作者认为，经济体和生物有机体一样，也有所谓的“干细胞”，通过类比，它包含“生物密码”和其他细胞和器官的形成机制。生物学家已经证明，胚胎干细胞可以通过影响某些生物信号和程序来创造和恢复其他细胞，以确保所有生物体的健康。坚持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并加以推广，熊彼特的创新可能就是这样一个“干细胞”，即经济发展的政治经济学。——作者注

示其有效性。但是，这一理论提出的应对危机方法，不是去激活创新过程，而是与紧缩政策的实施有关，即减少对科学、教育和创新基础设施的资金投入。这必然导致金融泡沫的形成，因为债务会产生新的债务，导致社会不平等和贫困的威胁加剧，特别是造成年轻人失业和未来不确定性的增加等。

我们认为，新古典经济理论缺乏对创新政策工具的关注，源于缺乏一种概念视野，即熊彼特式创新能独立创造新附加值，这有助于预算的增长，而不是将现有的附加值重新分配给新的物品和支出的额度。因此，基于新古典理论的政策并不能为一个国家带来理想的经济增长，特别是要实现包容性增长的时候。

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实际执行熊彼特式创新型发展模式的经济政策都很成功。这些国家包括有活力的东南亚国家、美国、加拿大、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德国、英国、瑞士、荷兰、爱沙尼亚、以色列等。它们将大量的财政资源用于国家人力资本的开发和国家创新体系的完善。这些正确的行动可能是对成功企业和国家有效活动的经验观察的结果，而不是大学教材的规定，或是遵循新古典主流理论的建议。

因此，我们认为，许多国家没有开展密集的创新活动，主要是对熊彼特式创新作为经济增长关键驱动力的作用缺乏足够的理论理解。它们重新关注传统的经济增长因素，对教育、科学、支持创新进程的机构和社会保障等领域采取了紧缩政策；优先考虑的是支持外国投资和金融贷款以发展传统经济部门的政策，没

有意识到建立先进的创新型产业结构的必要性。结果，这些国家不仅未能实现理想的增长，而且政治家们往往无法解释失败的原因，因为他们在采用公认的专家组织，特别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建议。但这些建议是新古典主义的，而不是熊彼特主义的方法。

这种冲突在转型经济体中最为突出。当分析这类国家的特点时，在许多情况下，我们是根据乌克兰的事实和材料加以审查的。一方面，这是由于作者生活在乌克兰，不仅可以通过统计和文献手段，而且可以通过积极参与制定经济政策的讨论和评估其结果，运用本人所熟知的经验和数据进行操作。这使我们能够更深入地了解政治家和专家们理解的概念性质，包括影响决策的外国顾问的意见。尽管使用了乌克兰的数据，但是作者的目的是并不是要突出乌克兰经济作为一个独立话题的特殊性。在本研究中以乌克兰为例的主要原因是，乌克兰经济在欧洲转型国家中已成为执行新古典主义理论处方的典型受害者<sup>①</sup>。

今天，经过 25 年的市场经济建设，乌克兰在人均 GDP、工资水平、养老金和社会保障方面已降至欧洲最后一名。我们认为，这是对经济发展的创新因素估计不足的结果。这一结论不仅适用于乌克兰，也适用于许多其他国家。这一论断的证据是本书的主要内容。乌克兰样本为我们提供了合适的案例，可以分析一个国家在创新发展因素实施不足时的矛盾方法。它使我们有机会发现

---

<sup>①</sup> 乌克兰曾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科技和工业（特别是航空工业和造船业）比较发达，仅次于俄罗斯。1991 年，苏联解体时乌克兰宣布独立。1994 年，乌克兰在独联体国家中率先加入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正式与北约建立合作关系。——译者注

和分析当前经济政策错误的深层方法论根源。

但是，这些进程也在其他转型国家表现出来，在这些国家，建立一个有效的市场制度实际上是从“零”开始的。因此，这些国家已经成为检验经济理论的一个独特的实验场所。本书通过经济发展的创新模式来考察这些样本。这一方法可以解释一些转型期发展中国家发现自己所处的“陷阱”，它们专注于提高传统产业产出的政策，却不支持创造强大的创新资源，以促进长期的动态发展。

包括乌克兰在内的许多国家未能在福利经济方面实现繁荣。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传统的建立市场机制的方法没有效果？政策制定者犯了什么样的错误？当前经济文献中常见的、典型的答案同样来自新古典主义方法：认为失败的原因是市场机制不健全，没有提供适当的环境来显示市场力量。但历史上有很多例子表明，实施这些新古典主义建议的国家并没有达到成功的水平。对这些问题的分析也必然会引导我们去阐述一个新的理论框架来回答这些问题。

本书中，我们想展示根据新古典主义理论建立的资本主义模式在现实中并没有改善大多数转型国家的生活，因为熊彼特将这种模式归为“静态”模式。而且，那些只遵守“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sup>①</sup>中“权威的”新古典主义处方的国家

---

<sup>①</sup> 20世纪80年代末，拉美国家因陷入债务危机而急需进行经济改革。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于1989年在其《拉美政策改革的进展》一书中提出拉丁美洲国家应采取的经济改革措施，包括与华盛顿机构所达成的十点共识。“华盛顿共识”反对发展经济学所提出的不完全竞争和政府干预观点，主张经济自由和个人行为的最优均衡，强调将政府干预减到最小。——译者注

遭受了重大挫折。

本书还详细介绍了乌克兰的另一个背景，不是因为作者想突出自己所在的地区，而是因为本书的主题对任何国家都很重要。这也涉及在现代理论话语中运用乌克兰著名经济学家杜冈-巴拉诺夫斯基（M.I. Tugan-Baranovsky）的经济危机理论的必要性。这一理论于1894年提出，被学界认为是第一个关于经济危机的科学理论。对于我们的分析来说，重要的是这个理论成为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 [ 通过阿瑟·斯皮托夫（Arthur Spiethoff）的影响 ] 的概念基础。这与证明经济危机内在客观因素存在的假设有关。这里重要的一点是，这些因素与创新过程直接相关。公众对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这一理论知之甚少，但为了更好地理解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和新熊彼特主义方法，了解这一理论是非常重要的。

对熊彼特方法的重新思考，为本书提供了一个新的方法论空间，以增进对现代出版物和教材中几乎被遗忘的一些关键基本概念的理解：政治经济学最初的关键主题，即国家财富的重要意义，不仅仅是帕累托均衡；价值理论、长期经济周期理论、结构性技术政策及创新对实际工资增长的影响。对核心理论范畴的反思，将通过比较新古典“静态”经济原理和创新“动态”经济的特点来进行。

本书的时效性在今天更加凸显，创新发展模式事实上与“工业现代化”的概念形成了竞争关系，而“工业现代化”在许多国家已经流行起来，特别是在那些创新发展潜力薄弱的国家中。

在这些国家，许多专家建议建立一个以现代化（包括通过创新）来支持传统工业企业的经济发展战略。这一观点的作用是有限的，因为今天传统的工业市场很快达到成熟，其盈利能力随之下降。当前的经济危机进一步证实了这一发现。

本书的结构如下。

第2章认为，在没有注意到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是一个系统学说时，主流经济理论发生了概念冲突。这就提出了严重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因为创新发展已成为成功经济政策的关键。本章揭示了熊彼特理论的核心范畴——创新的概念性现象，熊彼特的创新被看作是创造新附加值的独立因素。创新在新的“关于发展的政治经济学”中的作用类似于一个“干细胞”。研究表明，方法论上低估创新作为经济理论的基本范畴，导致了新古典主流理论与现代经济生活中的创新实践之间的鸿沟，这个现象令人无法接受。

第3章揭示了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的起源和实质。本章介绍了本书的核心方法论与研究成果，为“只有创新发展才能增加国家附加值”的命题提供了理论依据；它强调的结论是，基于传统生产结构的再生产和发展的经济行为无法获得国家财富的大幅增加。本章还分析了一个与熊彼特式创新理论相关的却鲜为人知的概念背景，该理论与巴拉诺夫斯基的商业周期理论以及新熊彼特主义的技术范式理论有关，这为新方法论视野下的经济发展周期和反危机国家政策奠定了概念基础。

第4章分析了熊彼特式创新在经济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并论证了熊彼特式创新在关于国家财富的政治经济学说中的重要性。结果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财富作为经济学主要研究对象的地位正在逐渐丧失。这一章表明，创新现象在新理论形成过程中并没有获得核心地位，在经济发展中仍然是“虽然存在却被忽视的因素”（Visible Invisible Factor）。技术创新不仅改变了经济史的进程，而且也改变了主流经济理论。

第5章探讨了现代社会试图为当前和未来的社会经济体系命名的方法论背景。结果表明，许多专家出人意料地回到了过去使用的术语，提出用“工业化”范畴的不同组合来定义新现象，而非“创新”范畴的术语。本章对这一争论进行了分析，认为这种观点是对熊彼特概念作为新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否定。传统的经济政策关注现有资源基础的竞争优势，并提出进一步现代化的建议。我们认为，必须创建现代熊彼特式的研究计划（Schumpeterian Programmes）以详细阐述创新模式，重点是创造新的知识资源，以获得新的竞争优势。

第6章对熊彼特主义关于经济发展的创新本质假设的可信度进行了定量检验。本章采用《全球竞争力报告》的评级方法，评价创新对各国福利的影响。结果表明，所有富裕国家都有一个积极的创新过程，而有活力的追赶型国家对实施技术创新表现出强烈的兴趣。本章还对乌克兰产业的结构性技术发展状况进行了分析，并按技术水平和技术范式对产业部门结构进行了分类。在经济发展创新理论的技术决定论背景下，这可能是一种对经济活动

的生产设施进行评价的有效分析方法。

第7章论证了熊彼特的创新范畴可以用来理解当代生产力下降的“悖论”，这一悖论是伴随着技术的根本变革和人力资本积累的增加而出现的。本章针对转型国家劳动力成本差异较大的问题进行了分析。用现有可比产品的劳动生产率的根本变化来解释这一现象是困难的，但可以考虑用工资政策的差异和生产技术结构的创新性变化来解释。分析表明，劳动力成本明显逐步上升的转型国家，如果能同时刺激创新活动，就能确保实际GDP的持续增长。

本书提出的创新发展新政治经济理论认为，一个国家的研发和技术创新领域与其说是发展结果，不如说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因素。在许多方面，技术创新通过危机后的复苏和扩张阶段，塑造了经济周期性浪潮。创新成为各国经济的主要竞争优势，决定了各国在世界竞争力排名中的地位，成为各国实现福祉的主要能力。

本书提出“创新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的新概念、分析紧迫经济问题和经济发展政策挑战的新视角，对许多国家，特别是转型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学术界、专业分析界和政界人士来说，将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同时，它也能吸引对现代经济问题感兴趣的社会公众。它会让读者对一些已知的问题有一个新的认识，或者认识新的问题，使人们更加重视现代经济理论的实际作用，这些都非常重要。